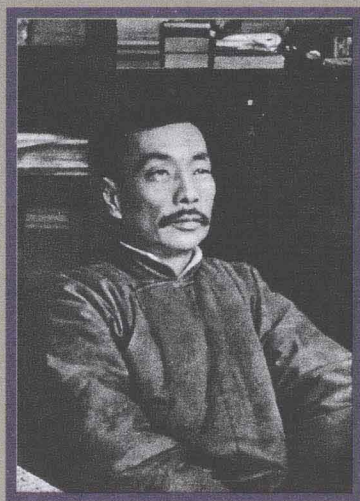




鲁迅：战士与文人

黄乔生 著

鲁迅：战士与文人

黄乔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战士与文人/黄乔生著.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47 - 7737 - 0

I. ①鲁… II. ①黄…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I2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8814 号

鲁迅:战士与文人

黄乔生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王晓宁
责任校对 裴红燕 李建平
装帧设计 付锁锁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新乡市电科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新乡市荣校路 195 号

邮政编码 453003 电话 (0373) 3713559 3712457



鲁迅五十岁生辰照

序 言

鲁迅的“战士”形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点记忆的人并不陌生,招贴画、连环画上的鲁迅,怒目圆睁、大手攥拳,像当时的工农兵代表一样刚正不阿、孔武有力。鲁迅自己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正好被拿来作为他的“战士”形象的最佳描述语。平心而论,鲁迅在某个时期被定型为“战士”,固然受了时代风气的熏染,但也不能说这完全是“文革”的“功劳”。他本人的确具有“战士”的品格。他写过《这样的战士》、《战士与苍蝇》等喑呜叱咤的名篇,也曾获赠“战士”的桂冠。

然而,鲁迅本人是清醒的,他知道战士也是凡人,也要生活。1927年,他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就有这样的遭遇和思考:“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啪啪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

我最近几年对鲁迅的照片做了些整理,写了一两篇文章和一本《鲁迅像传》,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鲁迅照片的拍摄过程和流传情况。一个人照相时,会不自觉地显出紧张严肃的神情,从鲁迅的相册中,我们的确能看到较多严肃冷峻的面容。在崇尚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时代,鲁迅性格中的这一面很容易被聚焦、放大。但这样的时刻的定格,不能作为他的全部生活和整体性格的表征。不能因为鲁迅照相时少笑容,就说他是刻薄寡欢之人。正如鲁迅自己说的:“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如题目所示,前者激越,后者婉转,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论者会有所偏重,可以理解,但不能夸大一面而忽略或者遮蔽另一面。鲁迅的形象,“战士”之外,另一面其实很明显,就是文人的一面。

这也是实际上的鲁迅:鲁迅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家。

我曾做过一篇演讲,题目是“战士品格,文人情怀:鲁迅形象的两面”,对于以往作为定论定式的“战士”形象,做了一些补充修正。后来又以“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为题做过演讲。在介绍鲁迅文人的一面时,我也指出,鲁迅在文

人中是奇特的一位，鲁迅的特点在于战士与文人、学者与文人的结合。这样看鲁迅，鲁迅的形象才会显得立体、全面。

我将自己多年来关于鲁迅的随笔和演讲十多篇汇集起来，交给大象出版社出版。因为内容芜杂，无以名之，斟酌再三，终于拟定“鲁迅：战士和文人”这样一个书名。比喻地说，我是在为鲁迅画像，虽然我不是画师，工笔、写意均一窍不通，我只能为鲁迅的真实画像提供一点材料，而且也许大多是琐屑的边角料，没有耸人听闻的情节，没有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论断，但是我觉得，认识一个人，他的生活细节是不能忽略的，有时候，细节反而更有助于将人物刻画得生动传神。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无论是全集，还是选本、语录，乃至外文译本，都是鲁迅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值得介绍给读者；介绍鲁迅的自然科学修养，可以让读者对鲁迅的知识结构更多一些了解；在关于鲁迅仙台期间行状和思想的一篇演讲中，我对国内外一些贬低鲁迅的倾向做了回应；关于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及他对这场革命的描绘、反思的几篇文字，对鲁迅是否加入革命党等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辨析，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并不急于给他戴上“革命英雄”的冠冕，对其描写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情状的作品，没有遽然断定是对辛亥革命做了深刻的批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介绍鲁迅北洋政府时期公务员经历时，也没有刻意把他打扮成反复辟、反军阀政府、讲民主、争人权的斗士。

我供职的处所是北京鲁迅博物馆，从事的是鲁迅文献整理研究、鲁迅文化普及工作，自知难免对研究对象产生偏爱乃至崇拜，因而常常自警：恪守学者本分，尽力为读者和观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平正的论断。随笔并不随便，力求言而有据；演讲更不装腔，沉实而有分寸。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希望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教正。

黄乔生

2013年6月30日于北京阜成门内

目 录

随 笔

民族魂	3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鲁迅全集》	13
关于《鲁迅与韩愈》	22
鲁迅语录阅读小札	32
梦里依稀慈母泪 ——为“珂勒惠支和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巡回展”而作	39
仰望与沉思 ——鲁迅诞辰130周年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80周年随想	49
杨宪益与鲁迅著作英译	52
一篇鲁迅未译的演讲《论英语之研究》译后记	62
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	73
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80
古都北京与经典鲁迅	88
日本记者笔下和镜头前的鲁迅 ——1933年大阪《朝日新闻》上的一篇报道和一帧照片	101
关于鲁迅“中式服装”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	109

演 讲

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 ——在“鲁迅与仙台”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115
---	-----

谈谈鲁迅的自然科学修养

——在“人文与科技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122

《毛泽东箴言》与《鲁迅箴言》

——在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学员论坛”上的演讲 132

战士品格，文人情怀：鲁迅形象的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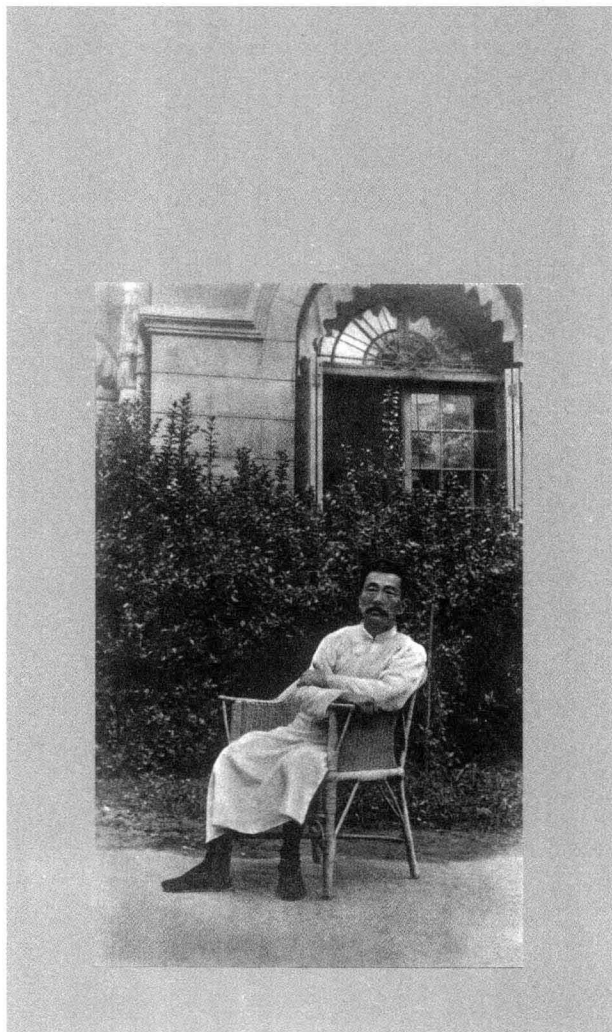
——在首都图书馆“人文精神与文化名人”讲座上的演讲 143

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

——在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162

隨

筆



民族魂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丰碑——《鲁迅全集》

关于《鲁迅与韩愈》

鲁迅语录阅读小札

梦里依稀慈母泪

仰望与沉思

杨宪益与鲁迅著作英译

一篇鲁迅未译的演讲《论英语之研究》译后记

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

鲁迅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和反思

古都北京与经典鲁迅

日本记者笔下和镜头前的鲁迅

关于鲁迅“中式服装”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

民族魂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时代的代言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一

鲁迅出生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江南水乡城市绍兴。这里山川秀美，俊杰辈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克强敌；王羲之兰亭法书，辉耀千秋；汉代王充，力疾虚妄世风；晋代嵇康，痛诋礼教虚伪；宋代诗人陆游志在报国，辞情悲壮；明代徐渭独立不羁，抗世违俗；清兵南下，明朝将亡，王思任为绍兴发出激昂慷慨的呐喊：此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1881年，鲁迅出生时，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但在民族压迫下呻吟，更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大屈辱。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入侵，政府腐败，民心涣散，失败的阴影笼罩全国。

鲁迅生长于书香门第。虽然当时的读书脱不出读“四书五经”应科举考试的老路，但毕竟有助于儿童少年熟悉中国古典文学。鲁迅自幼聪颖，博闻强记，长辈的开明思想也使鲁迅从小培养了广泛读书的爱好，使他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的熏陶。即如读史，除正史之外，他还广泛涉猎野史杂说，两相参较，纠正了正统历史观灌输的某些偏见，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

从印制粗劣的插图本古代小说的绣像中，鲁迅得到了初步的美术教育，这对他后来的美术研究和鉴赏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后来提倡版画，介绍西方美术，养成了高超的艺术鉴赏力，都可谓其来有自。

书本知识固然必要，而现实的经历更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性格发展，并且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养料。

农民的贫苦凄惨生活，让他感知了世事的艰难；祖父因为科场舞弊被判重刑，为疏通关节，免死减刑，周家不得不典物卖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经济也陷于拮据。避难到亲戚家时，竟被人称为“乞食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父亲的病逝雪上加霜，使作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养成了沉稳和敏感的性格。

家道衰落使他无法继续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也不能就读学费昂贵的新式学校，于是只好选择不收学费的军校。这在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是“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这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机会，让他去寻找与家乡这些眼界狭小、作茧自缚的人们不同的人们。

南京的读书生活让鲁迅接触了新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科技进步使一些国家获得领先地位，不久前打败中国的日本就大大得益于科学，中国应该急起直追，这是当时有志之士的观念。从旧学与新学的对比中，从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的差异中，鲁迅渐渐觉悟了。

1902年，鲁迅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在日本这个中国留学生众多、反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鲁迅不但学习了新知识，更培养了革命志向。他勤于思考，能参照他国的历史现实，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他探究中国民族精神衰萎的原因，萌生了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抱着治病救人并且通过医学传播科学知识的理想，他选择学习医学。在相对偏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作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他学习努力，在日语还不很熟练的情况下，成绩位居中游。但一年多的学习使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也使他产生了厌倦情绪，而早年对文学的爱好更时时在召唤他。当时，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深深地刺激着他。这一切，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医学，从事可以激发人心、疗治精神病痛的文学。

鲁迅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奉母亲之命回国完婚。他的妻子是乡下人，缠足，不识字。鲁迅很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婚约当守，母命难违。婚后第四天，他就带着刚刚获得官费留学资格的二弟周作人离家返回日

本。这桩婚姻给鲁迅造成了巨大痛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观。

从事文学，是他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爱好，但这是一条寂寞的艰苦的道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人学文学，即可以说明文学地位之低下。实际上，鲁迅等几位青年人所有的只是热情，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筹办杂志终告失败；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因为获得同乡的资助，得以出版，选择的多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意在激发中国人的自立自强意志。计划很美好，但短篇小说的体裁既不为当时中国读者所喜爱，他们的译笔又近乎诘屈聱牙，因此销行甚为寥寥。带着理想破灭的苦恼和沮丧，鲁迅回到国内，在家乡的学校谋到了教职。

辛亥革命爆发，使鲁迅心中生出新的希望，精神为之高涨。他期盼着出现开明的、为人民谋福祉的新政府。他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工作，勇于任事，敢于负责。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匡正政府的失误，他支持青年办报纸，施行批评和监督。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民族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给人民带来民主权利，革命胜利后不久，自古以来人们习以为常、视为天经地义的奴役关系和腐败政治在新名词的掩盖下变本加厉地肆虐起来。当一切都变得无可为，甚至自身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鲁迅再次离开家乡，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当职员。

二

1912年，鲁迅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至北京。政府机关下层官吏工作对于他是一种人生历练，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消磨。尽管他恪尽职守，很想有所作为，但军阀混战、皇权复辟、议员贿选，种种丑行，触目惊心，败坏心绪。他把中国比作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万难破毁，人们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却只带来可怕的结果。他只有沉入古代，抄写碑拓，整理旧籍，研读佛典。自1909年回国后十年来的沉寂和磨砺，加深了他的沉郁性情，养成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

要么在沉寂里发出痛苦的呐喊，要么在继续沉寂中消亡。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因为《新青年》朋友的邀约，他写出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品以“吃人”为中心意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害人的本质。中国历史原来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种时代：一种是人民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谓一治一乱，反复循环。乱，固然百姓苦；治，百姓亦苦。因为他们先天地失去了人的尊严，总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鲁迅通过狂人的似疯狂实清醒的语言，表达了他在极度失望后对中华民族的热切希望。他关心的是中国人如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就是创造出第三种时代，一个没有奴隶、没有压迫、没有“吃人”的时代。他热切希望下一代中国人能够幸福地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激越呐喊。

为希望而战斗，因失败而失望乃至绝望，又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奋起。这绝望后的奋起战斗，比为希望的战斗更加勇猛。因为他的认识更彻底，更没有牵挂和犹豫。

他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几乎篇篇采取新颖的格式，大都具有圆熟的技巧，对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生动的描绘。他用类似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常用的白描手法，三言两语使人物神态毕现。他笔下的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因此各具生命，读者不但在历史记录上找得到他们的影子，而且感到他们仿佛就在自己的周围游走。有些文章，字句间弥漫着中国文化特质，尽管大多是民族性格中令人闻之不快、见之不喜的因素。例如，《阿Q正传》是民族性的浓缩画卷，其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凝聚着民族性中的缺点，我们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虚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以真实的感觉的原因。鲁迅的文学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短篇小说上，他吸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融合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中呈现出社会及人物真实的一面，而又具有整体感。

在新兴白话文学中，鲁迅不但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新诗、散文等方面都做了探索。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中，他常使用既承接中国优秀散文传统而又富于思辨、形式也更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那就是杂

文。这种体裁最适合表达他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和深刻认识,成为除小说之外他的另一种标志性文体。他往往三言两语便切中要害,披露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及人物的隐秘心理。

鲁迅一面在教育部任职,一面在大学兼课,与母亲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过着传统大家庭生活。但几年以后,由于家庭矛盾,兄弟们不得不分开。尤其是1923年夏天周作人提出与鲁迅断交,使鲁迅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一直没有真正婚姻生活的鲁迅,在兄弟友爱中得到慰藉。现在,一直跟随他、了解他、帮助他、敬爱他,同他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教育程度相当,既是朋友更是战友的弟弟离他而去,他的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从他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一些奇异的意象、曲折隐晦的措辞中,读者约略能够体会到他的深刻的孤独和哀伤。

在一场大病后,他渐渐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阴影。他积极支持学潮,为青年学生呐喊助威,这使他重新获得生活和战斗的勇气。虽然因此屡遭教育当局的挤压,但他毫不畏缩。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极大的愤怒为死去的学生写了悼念文章,控诉这个黑暗的世界,号召青年们做奋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励他自己。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的一位学生——许广平同他走到一起。他们相爱了。鲁迅26岁结婚,过了近二十年的独身生活。他的虚构作品中很少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小说《伤逝》,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题材作品,写出后却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而是直接收入小说集。他对爱情的疑虑,多少反映在这篇小说中。他考虑的问题很多:恋爱的结果,婚姻生活的种种变数,等等。在小说中,他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美好的恋情上,而主要写感情的易变化、难持久及婚姻的失败。

尽管有这些顾虑,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不但感化了对象,更说服了自己:他需要爱情,他有理由也有资格获得爱情。他期望爱情带他走出失望和绝望的深渊。

爱情需要新的生活状态。北京的政治环境渐趋恶劣,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而他同许广平的恋爱公开后将会招致多少流言和攻击,也是不难想象

的。他们因此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谋职。

三

新成立的厦门大学雄心勃勃，在全国罗致知名教授学者。鲁迅是著名作家，又曾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有重要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但在中国小说史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金石学方面也有所积累。作家而兼学者，对学生的号召力不言而喻。鲁迅接受了聘请，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他带着爱情的鼓舞和对新生活的期盼，兴奋地走上讲台，但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他并不适合教学生活，也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他的兴奋点并不在学术，而在创作。但在厦门这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明地闪现在他的文字中。他从以往的孤独变得富有亲情，从坚硬变得柔和，也因为生活的沉静而从现实的战斗变为对往昔经历的亲切回忆。日常生活虽显沉闷，但因为沉浸在新获得的爱情中，可以以书信倾诉衷肠，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学校分成派别，互相排挤，继续上演在北京时期学界的矛盾斗争，使他厌恶。种种不便和烦恼，促使他很快到广州与情人会合了。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许多时间用于行政工作。困扰他的仍然是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静下来研究学问，还是观察人生，介入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从事创作，在广州这样的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适宜。

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军阀惨杀，党派暗斗，民众麻木，人心败坏。这一切，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厌恶，更是绝望。等待中国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黄河之水变清一样。他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人，新的革命运动中没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至多能成为同路人。他不愿进入争端，因此必须离开。对得势的革命者的专制嘴脸的痛恨，对未来的担忧，对历史的恶性循环的疑虑，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国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径究竟在哪里？

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上海还没有被军阀或党国完全占领,还留有一点儿言论自由。他打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版税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鲁迅成为年青一代文学家的攻击目标。他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只到革命的大本营做一个旁观者。他以往的功绩虽然让青年人崇拜震惊,但这本身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证据。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已经落伍,没有追求进步的激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在激烈的论战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功夫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亲自翻译苏联文学理论书籍,希望找到前进的方向。这场论战更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更彰显了他作为“五四”以来文学革命主将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绩,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带有审判性的言辞,用政治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概念是抹杀不了的。他在左右开弓的交战中,找准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而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阶级论的简单的直线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其文学价值值得怀疑。但这场斗争也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在阶级社会、政党政治里,一个著名作家是很难做旁观者的,甚至连做同路人也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鲜明地表达立场。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他在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础,也是他继续生存的条件——还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加入有党派背景的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他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冲破现有政治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种希望使他特别关注共产党已经成功夺取政权的苏联。对这个以往是侵华列强之一、现在开始公正对待中国而被其他列强包围和攻击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鲁迅给予极大的同情。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鲁迅有生之年未能亲临苏联考察,未能认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他的判断容或有失误,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新型政治制度的热切希望却因此充分显现出来。